

欽定熱河志

承德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避暑山莊 研究室

欽定熱河志

校點本

(清)和珅 梁國治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
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天津古籍出版社

據說各小學會認出這
全體古漢語課本

總編校
高亢

周殿芳

陳登億

齊敬之

寧大年

羅星明

陳子彬

王植彬

別廷峰

劉尚恒

審
訂

張虎剛

高洪鈞

責任編輯

韓嘉祥

《欽定熱河志（校點本）》出版后記

由承德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避暑山莊研究室承辦的《欽定熱河志（校點本）》項目，幾經周折，終於在避暑山莊肇建三百周年之際，作為獻禮本出版了！

《欽定熱河志》是清乾隆年間由中央政府主持編寫的一部地方志，是研究承德周圍及熱河地域內的歷史、地理、人文和旅游資源，以及研究清史、滿族史的重要歷史文獻，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一九八五年元月，承德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的避暑山莊研究室，與河北省教育委員會科技處簽定了《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議定書》，組織了本校十名教授、副教授，歷五年時間，對《欽定熱河志》進行研究、整理、校勘和標點。一九八九年十月五日，以著名史學家、方志學家、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傅振倫先生為主任委員，著名史學家、古籍專家、河北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協調委員會主任、原河北師範學院教授王樹民先生和承德著名學者布尼阿林先生為副主任委員的評審委員會，對《欽定熱河志（校點稿）》進行了評審和鑒定，并一致通過。專家評審意見認為：『整理后的《熱河志》，具有三大特點：第一，考版本流傳之虛實，結論自成一家說。第二，標點確當，段落劃分體現了相對完整性和全書連貫性的統一。第三，校勘注意核異同，尤重定是非。』既為承德地區的文化積累注入了有益的成分，也為各界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便于利用的第一手資料，嘉惠學林，厥功非淺。』

可是，由於經費沒有着落，此稿一拖就是十年，二〇〇〇年七月，承德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科研處派人對該書的出版進行多方面的考察、談判。展轉一年，幾經周折，終於在天津古籍出版社領導的支持下，于二〇〇一年八月商定由雙方共同出資出版《欽定熱河志（校點本）》。如今，新書面世，感慨萬千，十幾年的等待有了結果，相繼謝世的高亢、陳登億、寧大年、周殿芳等校點者，九泉之下總算得到了慰藉！

為了《欽定熱河志（校點本）》的出版，不少同志做出了貢獻：除了十位校點者和五位校對者以外，承德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和天津古籍出版社的領導，特別是耿向民、王建、湯雲航都給本書的出版以大力支持；科研處陳毅勤兩年來多次往返于天津、承德之間，與出版社編輯部韓嘉祥主任協商校對、排版事宜；參與校對的各位老先生為校點中的多處不足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見等等，是大家的共同努力促成了本書的順利出版，這里我們一并表示感謝！

一九九五年，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名錄，二〇〇三年又正逢避暑山莊肇建三百周年，謹以此書作為獻禮，望能為推動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研究工作的深入開展，貢獻綿薄之力。水平有限，本書的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歡迎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承德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避暑山莊研究室

二〇〇三年元旦

校點本《欽定熱河志》序

熱河承德，地當灤河之陽，氣候宜人，多湖淖灘梁，水草茂盛，是一天然牧場。遠自新石器時代早期，即有人類生息繁衍於此，以牧畜狩獵為生，創造了細石器文化、紅山文化。降及新石器時代晚期，接觸到彩陶文化，從而兼事農業生產。山多，田少且瘠，村落稀少，而民勞向義。按諸史籍：熱河在《尚書·堯典》為幽州甌脫。《禹貢》九州為冀州北境外域。成周北狄山戎來貢，始直通華夏。斯地在戰國為塞外，東胡居之，漢魏間為烏桓、鮮卑所據。東晉慕容皝崛起龍城稱前燕，始置郡縣，成了農牧之區。北魏置安州廣陽郡燕樂縣，今隆化縣土城子相傳是其遺址。北齊、北周以來，大抵與契丹、庫莫奚參錯而居，隋、唐皆為奚牧所，遼、金奄有其地。元明以降，南北暢通，成為北方各族人民經濟、文化交流之區。明初建興州衛，永樂元年改為諾音衛，清康熙時內附，雍正元年設熱河廳，十一年改為州，始有承德之名。乾隆三年又置熱河副都統（嘉慶十五年升都統），七年罷州稱廳，四十三年改承德府。民國二年撤府為縣，仍為都統及縣署所在。今為河北承德地區，是全國旅游勝地。由此可見承德自古以來就是我國北方重鎮。

清朝統一寰宇，天下一家，隔絕南北的長城成為兄弟民族溝通的橋梁。康熙四十二年建熱河行宮於承德。康熙、乾隆、嘉慶三帝鑾輿歲臨，北巡演武習勞，駐蹕于此。每年端午以至重陽，清帝在此避暑，且議政決策，閱批章奏，處理國家大政，時常舉行慶典，款待邊疆王公貴

族及蒙藏嘛喇，離宮遂成為清朝前期的第二個政治中樞，也是民族大團結的中心，故有『塞外京都』之號。是後熱河耕桑日辟，闡間以實。

承德地區處在邊陲，向無志乘。乾隆四十六年敕修《熱河志》百廿卷，傳本頗多訛誤，遼陽千華山民金毓黻靜庵先生詳加校勘，于民國廿三年刻入《遼海叢書》。乾隆欽定《熱河志》后，有嘉慶和瑛《熱河志略》（北京師範大學藏清抄本，不分卷。美國國會圖書館有清抄本《熱河志略》二卷二冊，署太庵和寧撰，每頁九行，每行二十字。）有道光海忠《承德府志》八十六卷（光緒李世寅重訂）。有光緒謝霖溥《圍場廳志》廿卷。民國間有八年施琦《隆化縣志》六卷，十年宣本榮《熱河地方志》和三十二年武尚權《熱河新志》，皆後修之書。

清高宗乾隆欽定《熱河志》凡分廿四門：《天章》《巡典》《徧遠》《行宮》《圍場》《藩衛》《文秩》《兵防》等，備載行宮典制、史實與文獻，可以考見清帝起居、政治、軍事和諸朝故事；其它十六門又歷叙地方政府區、天文、地理、資源、經濟、文化、教育和掌故，全書不僅是地方資治、教化和存史的依據，更是研究有清一代歷史的重要文獻。惟手民易誤，傳鈔多訛，我國古籍又向無句讀，故參考利用者時感不便。承德師範專科學校「避暑山莊研究室」諸位教師選《遼海叢書》本欽定《熱河志》作為藍本，又參考有關史籍多種，更事校訂，刪衍補脫，乙倒厘正，或本校，或互證，求其至當。勘異文者九百餘條，或闕疑，或并存，辯證精審，且加以標點，編制索引，成為完善之本。自一九八四年起，辛勤校訂，歷五年而畢工，自是《熱

河志》始有文字正確，標點清晰便於檢尋，參考利用之書，誠研究國史，編纂新志之所必備。嘉惠士林，功德無量！書既成，行將付梓，因泚筆而述其顛末。

傅振倫 一九八九年己巳歲霜降序於北京安貞里

時近二十世紀未滿，我歲在癸卯年歲次壬午之秋，應《中原學報》之邀，為之寫一篇短文，以記憶這段生活。我出生於河南開封，讀大學時曾在開封大學、鄭州大學讀過中文，後又在華中師大中文系讀研究生，一九八七年畢業。我回開封教過書後，就來到河南博物館工作，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來到河南大學工作，直到現在。我從事教育、博物館工作四十餘年，對中國歷史文化有較深的研究和了解，但對於古籍的整理與研究則沒有多少研究。《河志》是我在這方面的一次嘗試，希望能夠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和評價。

會晤傅先生是在他採購書籍的時候，因為我們都是開封人，所以很快就熟識了起來。傅先生對古籍、對書店調查、藏書瞭解。在開封之後，傅先生會來古書攤逛逛，或向書商採購古書。傅先生喜歡藏書，古書古籍書店幾乎去了。他的藏書大致有《唐宋文》、《唐宋詩》、《宋詞》、《元曲》、《明清文》、《明清詩》、《元明詞》等。他的藏書在當時並非多麼珍奇，但對於研究開封歷史、研究河南歷史、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等都有一定價值。

齊東野語 卷之二

校點本《欽定熱河志》序

承德師範專科學校避暑山莊研究室諸同仁，以五年時間點校完成的《熱河志》一百二十卷，在傳世的清乾隆欽定《熱河志》中實為最佳版本。不僅校勘精審，得以補遺正誤；而且輔以實地調查，頗有創獲。完稿之後，經河北省教育委員會及省高等學校古籍整理研究協調委員會組織專家學者進行成果鑒定，認為優點突出，已達到公開出版的學術水平。現已決定付印，以廣流傳。

《熱河志》是最早記述今日承德地區及其臨近地方的山川風物與歷史變遷最為詳盡的一部志書，前人評論，認為『今世之人，欲考灤陽掌故、木蘭宮囿，蓋舍此而莫由。』實非過譽。現在隨着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發展，對於承德地區研究的要求，已不僅在於了解過去的宮囿掌故，更重要的乃是通過深入研究這一地區自然環境的演變過程，從而為今後的發展建設，提供科學依據，作出新貢獻。為了滿足這一新的時代要求，《熱河志》同樣是有重要參考和利用價值的。即以承德市的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為例，康熙、乾隆兩朝相繼興建時期的自然環境；迄今有何變化，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首先必須盡可能地復原其原始景觀，然後進行今昔之間的對比，力求闡明其演變過程，從而為進一步制定規劃以發展這一舉世聞名的園林勝迹作出貢獻。着手之初，《熱河志》當是提供各種直接或間接信息的主要來源。過去雖然已有這方面的專題寫作，似乎尚缺乏綜合性深入而系統的研究。以此類推，同樣性質的科學研究，如果擴

大到整個『木蘭圍場』的範圍，其成果當更加值得重視。

總之，北京以北的所謂塞上地區，亦即《熱河志》所涉及的主要部分，與首都的地理關係至為密切，其位置適居『三北』防護林的重要地段，既無異於首都地區的外圍屏障，又是其主要水源的最上游。正是在這一範圍內，《熱河志》提供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關於自然環境演變過程的信息來源，有待于系統的提取和利用。但願這部點校本《熱河志》得以早日問世，庶可汲其精華，為我所用。因就管窺所及，略述為上。刍蕡之議，謹供參考。

侯仁之 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於北京大學燕南園

校點本《欽定熱河志》序

承德師專及避暑山莊研究室諸位專家，以熱愛鄉土史之熱忱，點校《熱河志》書成，問序於余。余欽佩此項工作實具有重要意義，故欣然為之序。

余嘗治蒙古史，深知熱河一地在清代統一事業中，曾發揮重要作用：既為連結蒙古各部之紐帶，又為彙集黃教寺院之中心。蓋當時拉薩黃教主可以干涉信仰地方之行政，其勢力所及遍及內、外蒙古，青海各部，兼及西域甚至四川、雲南。故清朝初年三藩之叛，噶爾丹、阿睦爾撒納之亂，黃教及其幕後大農奴主皆直接間接插手其間，阻撓政府政令之通行，軍旅之派遣。康熙皇帝內斷於心：知興黃教，即所以安衆蒙古，然教權必須從屬於中央政權，方能鞏固統一國家。故於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平定噶爾丹後，即大會內外蒙古僧俗封建主於多倫，於其地建彙宗寺，寺僧由內外蒙百二十旗各出一人，聚而成之。命章嘉呼圖克圖駐此以司內蒙及內地之黃教，外蒙則令哲布尊丹巴主之，以分拉薩黃教之勢。會址擇多倫，因多倫乃元朝上都之地，活佛命章嘉，因章嘉實元代帝師八思巴之法裔也。

既而，內蒙古喀喇沁、翁牛特等部以康熙帝歲歲北巡，敬獻牧廠以為木蘭秋狩之地。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在熱河建避暑山莊，以為行圍召宴蒙古王公之所。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康熙帝六十壽辰，蒙古各部同詞陳請建溥仁、溥善二寺於山莊之側，為帝祝福。蒙古王公觀見之所及黃教中心，始自多倫移至熱河。熱河遂成為清帝召見藩部、屬邦、域外使臣宴會、詐馬

之地，山莊正門曰麗正門，概沿襲元代大都宮殿正門之稱，詐馬實元俗，皆有深意存焉。

乾隆帝繼承祖志，於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在厄魯特四部長覲見前，在熱河仿西藏古刹桑鳶寺建普寧寺，取『普天之下，率土安寧』之意。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再定伊犁，仿準噶爾之固爾札都綱，建取義『遠方安寧』之安遠廟。三十一年（一七六六），西域哈薩克、布魯特各邦來屬，又在山莊建東向之普樂寺，供《大藏經》中之『上樂王佛』，明示西域各邦應永向中國。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又仿拉薩布達拉宮建普陀宗乘廟於山莊之北山。四十五年（一七八〇），乾隆帝七旬壽辰，六世班禪親來祝嘏，又仿後藏扎什倫布寺，為其建須彌福壽之廟。皆取藏語漢義命名。先此已把五臺山臺麓寺移建於此，命名殊象寺，寺中文殊塑像，則仿乾隆帝之御容。

以上這種把前藏、後藏、多倫、伊犁、五臺諸名刹，仿其形制，移建熱河，實具深意。概山莊宴享，既列毳帳而沿用蒙俗；寺廟彙集，又各按建築原型，以顯示黃教中心。實俾四裔藩屬之向心，中華大國之永固。

故《熱河志》一書，此次標點整理，必廣為流傳，不但佳惠學界，有重要史料可稽；尚可視為借鑒，則又現實之意義存焉。

《欽定熱河志》校點說明

熱河地處塞北，漢魏以前，一直是鮮卑、烏桓等民族游牧的地方，到了晉咸康初，慕容氏崛起龍城，這裏才有郡縣的設立。這在《魏書·地形志》，可以看到一個大略的記載；周、齊以後，這裏又成了契丹、庫莫奚參錯而居的地方，往來無定，地理位置也就不能確指了。遼、金、元三朝，這裏是政治活動的重要場所，但當時記載缺略。明永樂間，盡棄大寧（今平泉赤峰一帶）以外之地，這裏就成了荒蕪之域了。元代撰修遼、金二史時，以屢遭兵燹，載記蕩然無存，修史者無可考證，所以粗略訛誤之處很多。明修元史時，也以傳聞失真、史料多有不實，草率成書，其中有許多紕繆之處，所謂『名號不掌於職方，形勝無聞於地志』。對清以前這一帶地方來說，并非完全浮誇之辭。

清康熙時，諾音諸衛內屬，這裏才在清廷統治之下，可是這裏仍很荒蕪，人烟稀少，到了康熙四十二年，（公元一七〇三年），在這裏建熱河行宮，皇帝每年夏秋，到這裏避暑行圍，每次要在這裏停留約三四個月，即以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為例，於五月中旬到避暑山莊，九月中旬返京，其間約五個月。因此，各地居民逐漸遷來，『閭閻日以富，耕桑日以辟』。乾隆時，認為修志的條件已具，乃命和珅等撰修《熱河志》，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熱河志》修成，可以說這裏記述塞北地方山川風物，歷史變遷最早最詳備的一部書，吳延燮說：『廟謨諄勗，從臣殫力，賅博翔實，若在畿輔之右』。金毓黻說：『今世之人，欲

考灤陽掌故，木蘭宮園，蓋舍此而莫由矣。』

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山莊建築，日益完備，康、乾二帝每年都來這裏避暑，到圍場打獵，在這裏還要接見蒙古、西藏等少數民族首領，許多政事，要在這裏處理，章奏要在這裏批閱，萬壽慶典要在這裏舉行，這裏已成為清廷的第二政治中心。《熱河志》中『巡典』、『徠遠』、『寺廟』諸門，對清廷與少數民族的往來，都有記載。即當時的一些御製詩文，有的也可補清史的缺略，為研究清史者的重要參考。如《普寧寺碑文》、《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記敘了平定準噶爾部幾次叛亂的經過。《須彌福壽之廟碑記》，記述乾隆四十五年（公元一七八〇年），班禪喇嘛祝皇帝七旬萬壽來承始末，均可為清史的佐證。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三年）六月所寫的《復雨》、《喜晴》二詩，表達他因陰晴而影響驛路暢通與否的憂樂心情，可以窺見大小金川之役的情況，又如乾隆四十四年《中秋日作》中有句云：『酉年此日收烏什，未歲今朝克勒圍。』指明阿桂攻克勒烏圍是在八月十五日，《清史稿·高宗本紀》：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八月己亥，阿桂等奏克勒烏圍之捷，己亥是八月二十四日，《阿桂傳》只說八月克勒烏圍，沒說具體日期，這首詩可補清史細節。

《熱河志》中徵引了許多古藉，如《水經注》、《元一統志》、《武經總要》、《行程錄》等，其中有的書今已失傳，如《元一統志》，據《四庫全書總目》說：『元岳璘等所修《元一統志》，最稱繁博，共為一千卷，今已散失無傳』。而《熱河志》中徵引了許多條，吳廷燮說：

《元一統志》今已罕覩，是志徵引至到道裏，卓爾詳備，元志不泯，于斯焉繫”。可見《熱河志》對於保存古籍，起了一定的作用。

《熱河志》對所引古書，多加考證，糾正了一些古記載的謬誤。如乾隆的《熱河考》，糾正了《水經注》中記述武列水三個上源會合先後的錯誤。《灤河濡水源考證》，論證了歐陽修所說的『灤水出炭山東北』及《元史·河渠志》所說的『灤水出金蓮川中』的錯誤。《遼史·地理志》本多錯誤，《熱河志》徵引時多加辨證。如《遼志》稱中京大定府，拓跋氏建牙於此。《熱河志》引《元一統志》辨證說：『建牙者及奚之部族，非拓跋氏』。又說：『遼志于諸地沿革援引漢縣，率多影響。所引唐某州某縣，皆唐羈縻州縣之名，其時多屬僑治，并無疆域。《遼志》所引，未免出於臆撰』，這類地方，對舊志有補正之功。《四庫全書總目》謂是書『考古證今，辨疑傳信，既精且情，蔚為輿記之大觀。』這又是《熱河志》的一大可貴處。

《熱河志》一百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修成後，旋即刊行，就是現在的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作『欽定《熱河志》八十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清史稿·藝文志》也作八十卷。實際上，并沒有八十卷本刊行，《四庫全書》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一七八二年）距《熱河志》之成書，僅晚一年，想其最初決定把這書收入四庫之時，在本書寫定獻上之前，所寫提要，系根據《熱河志》的初稿欽定《熱河志》獻表中說：『前茲副稿臚呈，已摩偏之略具，繼以綸言指示，期辨訂之加詳。』可知初稿已具有二十四門的規模，而內容比較簡

略，後奉乾隆指示，要更加詳盡，於是又增補內容，詳加辨正，由八十卷增至一百二十卷，武英殿所刊行者，即增改後之稿。《總目》對前所寫的提要，未加改正。《清史稿》雖成書較晚，也未按原書而仍襲《總目》之誤。獻表中又說『二十四門州居部次，期鉅細之無遺；一百廿卷，類別區分，庶初衷之畢貫』。可見書成獻上之時，已是一百廿卷了。《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熱河志》條下：續錄『殿刊本，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刊本，一百廿卷』《標注》刊行于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可能是後來查閱原書而加以改正的。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熱河志》一百廿卷，而前面所附紀昀于乾隆四十九年所寫提要，仍為八十卷。為什麼會有這樣矛盾呢？金毓黻在《重刊〈熱河志〉跋》中說：『昔者清高宗以文淵、文源、文津三閣四庫全書，舛誤不一而足，爰有責總纂紀昀、陸錫熊復校賠寫之旨，而錫熊又以赴校盛京文溯閣書，感寒而卒，近檢文溯閣庫書，一卷之中，錯誤數四，未經校改，纂校諸臣，經辦不善，誠無可諱言矣。』這就是《熱河志》卷數存在分歧的說明了。

一九三四年，金毓黻等人刊行《遼海叢書》，第一部就刊刻《熱河志》，于是又有了《遼海叢書》本。《重刊〈熱河志〉跋》中說：『乾隆四十六，敕修《熱河志》成書。旋即刊行。即世所稱武英殿本是也。毓黻所見者，僅盛京故宮弆藏之本，此外則不數數見。遼陽袁氏所藏寫本，蓋自故宮本逐錄。』這就是說，他這次重刊《熱河志》，所根據的仍是殿本。他『參比諸書，詳加謾正』，改正了許多錯誤。如卷一百〇四《外紀》，叙後燕慕容氏，北燕馮氏之事迹，

皆取《十六國春秋》後燕北燕兩錄，原本慕容熙封「遼東公」，而此本以「東」作「西」，馮跋之子名乳陳，而此本以「乳」作「汝」。以《晉書》載記正之，《十六國春秋》並不誤，不知修志時依據什么。又卷一百十八《藝文》，載金韓長嗣《興中府尹銀青改建三學寺碑銘》一首，以《塔子溝紀略》校之，一篇之中，訛誤衍奪至二十餘字，「孔目官孫公」，以「孫」為「係」，「忝居治下」，以「忝」為「奈」，《詳言於予》，則奪「於」字，「皆權於私院」，則衍「皆」字，都一一加以訂正。

經過這番整理，遼海叢書《熱河志》，可以說是最好的本子了。但印數不多，購求不易，沒有標點，閱讀不便。並且其中仍有一些錯誤的地方。承德是我國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前來參觀問者絡繹不絕。他們想知道承德的現狀，也想知道承德的歷史。為了有利於對這文化名城及清史的研究，我們把這部書加以標點，并以殿本《熱河志》及《承德府志》作通校，以《大清一統志》、《水經注》以及《清史稿》、遼、金、元史和其它史的有關部分，加以校勘，務期對於本書文字的脫、誤、衍、倒等，盡量改正。這次校點，共勘出異文五百餘條（其明顯筆誤容易識別者不計）。

遼海叢書本《熱河志》，既是根據殿本而改正的，今天再以殿本校勘，殿本中的錯誤，叢書本已改正的，就不再加注明。如卷三十三《千尺雪歌》：『又不見土鼓先生雲謾』，「土」殿本作「士」，叢書本改為「土」，就不再注明了。